



珞珈语言文学丛书

“现代汉诗”的眼光

—— 谈论新诗的一种方法

荣光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珞珈语言文学丛书

“现代汉诗”的眼光

——谈论新诗的一种方法

荣光启◎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诗”的眼光: 谈论新诗的一种方法 / 荣光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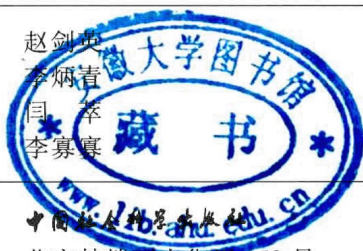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161 - 6047 - 3

I. ①现… II. ①荣…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5633 号

出版人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赵剑波
李炳清
闫 幸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诗歌本体的谈论	(1)
------------------	-----

第一章 基本理论 经验、语言与形式的互动生成果效:评价新诗的

“标准”	(6)
一 辨析:“标准”与“尺度”	(6)
二 当代诗歌:本体认识无“标准”	(8)
三 “现代汉诗”:对新诗的一种谈论方式	(11)
四 深度个体言说:经验的尺度	(12)
五 对“现代汉语”的自觉:语言的尺度	(14)
六 诗之本体的意识:形式的尺度	(16)
七 当下汉语诗坛的状况	(20)
八 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自由”与限度	(23)

第二章 从“新诗”到“现代汉诗”:王光明的诗歌批评之旅

一 批评的起点:“面向新诗的问题”	(28)
二 本体话语:中国现代诗的“艰难的指向”	(31)
三 批评的转型:“从基本问题出发”	(34)
四 本体反思:从“新诗”到“现代汉诗”	(38)
五 建构现代汉语诗歌的本体话语——《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之意义	(43)

第三章 “经验、语言与形式的互动”与新诗的发生(一):晚清诗歌的

内在矛盾	(65)
一 黄遵宪的《今别离》	(66)

二 彰显矛盾的诗歌写作	(78)
三 汉语言说方式的“维新”	(84)

第四章 “经验、语言与形式的互动”与新诗的发生(二):从“白话诗”

到“新诗”	(88)
一 经验对古典诗歌形式美学的冲决	(89)
二 “自古成功在尝试”	(95)
三 《女神》的独特句法	(99)

第五章 涅槃凤凰的今朝:“经验”的迷思(一) (106) |

一 对当代诗的不同评价	(106)
二 “失范”与寻求“标准”	(109)
三 季羨林评新诗	(113)
四 “单翅鸟”如何能飞?	(118)

第六章 “底层写作”与写作的“道德”:“经验”的迷思(二) (119) |

一 “打工诗歌”引发的的问题	(119)
二 什么是文学的“底层”?	(122)
三 当代诗歌写作和阅读上的道德化倾向	(127)
四 什么是写作的“道德”?	(133)

第七章 女性经验与诗歌写作:关于诗人阿毛 (137) |

一 “女人辞典”:“创痛的经验”	(137)
二 “午夜的诗人”:性别超越与写作焦虑(上)	(139)
三 “午夜的诗人”:性别超越与写作焦虑(下)	(143)
四 “午夜的私语”:以女性经验想象世界	(145)

第八章 从语言本身入手更新汉语言说方式:任洪渊诗的意义与

问题	(148)
一 “在语言中改变世界”	(148)
二 “生命只是今天”	(151)
三 诗与“诗学”的纠缠	(159)

四 尚未“展开”的诗歌	(162)
第九章 汉语的“美声”唱法:张执浩与当代诗的语言	(168)
一 不能“终结”的“爱”	(168)
二 “美”与“苦于赞美”	(171)
三 有限个体的艰难歌唱	(173)
四 汉语在词根处的敞开	(176)
第十章 形式意识的自觉:闻一多诗歌写作的意义	(180)
一 作为诗人的闻一多	(180)
二 早期新诗的“形式”建设	(183)
三 “形式”产生的意味	(185)
四 “形式”意识的当下匮乏	(188)
五 汉语诗人的“形式”探索	(190)
第十一章 一个典范性的文本:闻一多《死水》集的意义	(196)
一 “困难”的写作	(196)
二 哪些“困难”?	(198)
三 如何“克服”?	(202)
四 得何“喜悦”?	(205)
第十二章 “放不下形式的问题”:新诗的重要“传统”	(207)
一 “传统”的意思	(207)
二 “新诗本身也已经是一个传统”	(208)
三 “放不下形式的问题”	(211)
四 节奏是诗歌的灵魂	(214)
五 新诗“自己的传统”之于当下的意义	(215)
第十三章 不确定的“现实”:现代汉诗写作与阅读的难度	(220)
一 “现实”:不同的理解	(220)
二 “现实”:不同的态度	(221)
三 “反诗歌”:以想象为“现实”	(227)

四 重新理解“诗和现实”的关系	(230)
第十四章 诗本体的忽略:一个当代诗命名的问题	(233)
一 “中间代”:问题的提出	(233)
二 诗歌命名的“历史”情结	(236)
三 “新”诗逻辑的推论实践	(240)
四 “非代性”和个人化的写作	(244)
五 “中生代”:一个可能的命名	(251)
第十五章 “典律”建构:沈奇的现代汉诗“诗学”	(254)
一 “诗学”:批评话语背后的忧心	(254)
二 “典律”:现代汉诗的本体想望	(256)
三 “简约”:汉语诗歌的“正根”?	(259)
四 现代汉语:能否回到古典形态?	(261)
五 “本体”探寻:在经验与形式之间	(264)
第十六章 “汉语诗学”、“中国诗学”与“现代汉诗”:新诗批评中的 “本体反思”话语	(268)
一 郑敏“汉语诗学”的理论来源	(269)
二 郑敏诗学对“新诗”的启示	(273)
三 郑敏诗学带来的问题	(274)
四 叶维廉“中国诗学”的西方资源与中国本位	(276)
五 中国诗的语言策略与美学效果	(278)
六 叶维廉对“新诗”的批评与建议	(280)
七 郑敏、叶维廉诗学的共通性及问题	(281)
八 一种参照:“现代汉诗”的眼光	(284)
余论 我们如何认识新诗?	(287)
一 对新诗的理解	(287)
二 新诗的来源	(288)
三 新诗的目标	(291)
四 新诗的问题	(292)

五 新诗的未来	(294)
附录一 汉诗写作的精魂:台湾当代诗	(297)
附录二 诗能干的事:影响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感受性	(308)
后记	(312)

导 言

诗歌本体的谈论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说话方式”），在一切文类中，它的形式感是最突出的，它对语言、意象的要求是最严格的。诗歌言说“现实”经验、思想、意义，但它并不直接满足人的意义诉求，更不直接等同于“现实”，而是在具体的“语言”形态和特定的“形式”机制中间接呈现“经验”的现实。这样的话，当我们谈论诗歌的发生，有三个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即现实经验、语言符号和艺术形式。从“新诗”所在的历史时间看，与此相关的分别是：个体的现代性的现实境遇，汉语所必须面临的现代转换和诗歌传统形式与现代经验的冲突，由此我们将涉猎“新诗”的“现代”语境、“汉语”方式及“诗”的本体特征。

事实上这是一种以诗之本体为核心的谈论方式，强调的是诗之为诗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本书虽然也认同“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差别，但还是认为用这一概念并不能较好地谈论晚清以来中国诗歌问题的复杂性。“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这一命名无法指涉诗歌的本质和价值；在诗歌的写作实践中，“新”和“旧”的因素、现代和传统的东西，并不是意识形态中的对立关系，而是转化、交换关系；“新”的诗不见得是“好”的诗，“旧”诗的方法未见得就不能在“新”诗里使用。

从语言角度，“新诗”的语言——“白话”也在传统和西方“文法”的多方“对话”中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现代汉语。

从形式角度，“新诗”的体式“自由诗”也不能被绝对化，不加分辨地崇尚“新诗应该是自由诗”^①，无视诗歌所必需的情感的内在节奏、声

^① 冯文炳：《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冯文炳（废名）：《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音美学，而是应该在经验和语言、诗行之间寻找节奏的美妙平衡，建设真正“现代”的“诗形”。

若是从经验、语言和形式三方互动的角度来看待现代诗歌，我们应该能触及晚清以来中国诗歌的许多重要问题，就不至于偏执于其中一方把诗歌的问题简单化。故此，本书愿以现代汉语诗歌（简称“现代汉诗”）的眼光^①来看待“新诗”、来面对20世纪中国诗歌的问题，力求关于诗歌“发生”的辨析紧紧抓住“现代”（现代经验）、“汉语”（现代语言）、“诗歌”（现代人的情感与形式）三个要素，强调对诗歌本体特征的自觉的意识。

以“现代汉诗”的概念来与20世纪中国诗歌“本体”特征做全面“对话”的文本资料，据本文有限的了解，目前学界已有民间诗刊《现代汉诗》^②；学术著作有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奚密的《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③和国内诗歌研究专家王光明先生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④以及王光明主编的一部论文集^⑤。而从“新诗的发生”角度来考察现代诗歌作为一种文类到底是如何确定的，目前尚只有一部优秀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教师、当代中国一位优秀的诗人和批评家姜涛所著的《“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研究》^⑥。

不过，民间诗刊《现代汉诗》主要是诗歌创作文本，是诗歌写作的具体探索，至于对“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完整认识和自觉意识似乎还很欠缺。而奚密教授在著述中有“现代汉诗”的提法，但从她的行文可以看出，其“现代汉诗”一词也可以用“20世纪中国诗歌”、“中国现当

① 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具体论证详见王光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及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的“导言”部分。

② 大型诗刊《现代汉诗》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一份颇有影响的民刊，1991年1月创刊，创刊号在北京印行，至1995年底，共出9册。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各地诗人参与。在此发表过作品的诗人有欧阳江河、于坚、西川、王家新、翟永明、张曙光、朱朱、小海、肖开愚等一批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人。

③ [美] 奚密（Michelle Yeh）：《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⑤ 现代汉诗百年演变课题组编：《现代汉诗：反思与求索》，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⑥ 北京大学2002届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先生指导。2005年4月收入洪子诚主编的《新诗研究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代诗歌”等概念来代替，没有体现使用这一概念时所必需的对“诗歌和现代性话语及情境、现代语言相互缠杂状态”的自觉意识。并且，此书的价值不在于其谈论了“现代汉诗”，而在于谈论了现代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边缘”性^①。姜涛的著作，从社会学、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谈论社会阅读空间和读者的某种诗歌“阅读程式”的形成与“新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文类确立之关系，论文挖掘了大量民初至五四时期的诗歌文本、论争方面的资料，也吸纳了较新的西方文艺理论（如[美]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等），确实深入地探讨了20世纪中国诗歌的早期形态——“新诗”的发生，给当前学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许多宝贵的启示。

真正将“现代汉诗”视为一种特定的诗歌形态、作为一种对诗歌“本体”的自觉意识来谈论20世纪中国诗歌，且论及其“发生”的，是国内的诗歌研究专家王光明先生。在其代表性的著作《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王光明以“现代汉诗”诗学理念为出发点，谈论了大致从1898—1998年这一百年的诗歌演变历程。他将从晚清的“诗界革命”（1898年前后）到五四时期（1923年左右）这一时期称为新诗的“破坏时期”；从20年代开始，延续到40年代的诗歌在“诗形”和“诗质”方面双向寻求的时期，被称为“建设时期”；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现代汉诗在内地、台湾和香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分化期或多元探索的时期”。尤其是他对“晚清”的论述对笔者深有启发，使笔者对现代汉诗“发生”的考察延伸到晚清、1898年以前。

在人们的印象中，晚清诗歌似乎缺乏诗歌的审美性，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而已。但王光明在此追究：为什么“必须过渡”？具体怎样“过渡”？留意晚清诗歌的人都会注意到，“诗界革命”的同人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提出要反对那与“新语句”和“新意境”极不相称的“旧风格”（或“古人之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唯“新”的“诗界革命”话语似乎在此显出极大的矛盾：为什么其他都可以“新”，唯有“风格”

^① 这部著作“采用‘边缘’作为一诠释批判性观念来探讨现代汉诗发展的脉络，触及史上几个重要的运动和争议同时提供一理论架构来分析现代汉诗的现代本质，包括美学和哲学特征。‘边缘’的意义指向是双重的：它既意味着诗歌传统中心地位的丧失，暗示潜在的认同危机，同时也象征新的空间的获得，使诗得以与主话语展开批判性的对话”。奚密（Michelle Yeh）：《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第1页。

不可以？为什么诗人们从不怀疑：诗歌的“新”，难道与作为诗歌整体特征的“风格”无关？为什么就没有人想触动这一最明显的矛盾物或撼动不了？这个症结主要在于王光明所说的中国诗歌“古典形式符号的物化”。“晚清诗歌最大的特点是以内容和语言的物质性打破了古典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封闭性，是一种物质性的反叛。”^①“它醒目地彰显了古典诗歌体制与现代语言经验的矛盾与紧张”^②。晚清诗歌与现代性经验的表达、与现代语言的紧张关系表明了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权势的结构”及其束缚力量。虽然晚清诗人没有真正在诗歌内部找到解决的方案。但接下来胡适一代人正是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胡适、陈独秀们就是以突破这“权势的结构”为起点，从语言、形式入手，以那不符合“结构”的、根本不能入诗的白话文（白话文事实上是一种说话方式，不求炼字、用典、韵律等）入诗，以自由诗的形式，在几经“尝试”与批评责难之后终于获得初步成功。在对晚清诗歌的述说中我们看到了王光明对待诗歌历史的开放性（不“锁定”历史、轻易忽略它、评判它）和对诗歌“本体”的关注（着力于谈论诗歌文类的自身特征）。

王光明紧紧抓住现代经验（现代性语境、个体体验），诗歌文类特征（诗歌的情感、想象方式、形式问题），现代汉语、现代语言三个方面的问题，考察这些问题与具体的诗歌写作的碰撞，揭示现代性、诗歌、语言三者历时和共时的“权力”交叉与“利益”交换。他极力避免将开放的问题历史化、将亟待阐释的文本经典化、将“流动”的主体予以定性，而是力求开放探求的过程。在重新述说中国现代诗歌的百年历程、在辨析“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本体要求”三者互动关系的诗性言说之中，王光明尝试了一种可以称为“现代汉诗”的诗歌本体话语的建构。这种在“三方互动”中谈论诗歌的话语建构方式虽不能确立诗歌的本质，但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切近诗歌本体的有效路径。这一话语在诗歌研究和诗歌创作中的实践，对于培养辨识现代诗歌的纯正艺术直觉，培养现代诗歌写作在语言、形式、经验转换的自觉意识，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

①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毫不讳言，本书的写作受这一诗学理念影响至深。本书的源头在王光明先生的著作《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而本书的准备则在拙作《“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可以说，本书由它们衍生。

第一章

基本理论 经验、语言与形式的互动生成效果： 评价新诗的“标准”

一首诗的好坏的“标准”问题首先在于对“何为诗”的本体认识上的分歧，无“标准”，自然亦无评价“何为好诗”之“尺度”。新诗其实是一种现代汉语诗歌，我们至少可以从“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汉诗的本体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互动、纠缠和克服的一种状态，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必要的谈论尺度。

一 辨析：“标准”与“尺度”

评价一首现代汉语诗歌的好坏的标准，自新诗诞生起就在不断变化。沈从文在《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一文中曾谈到，新诗的革命虽创自“第一期诗人”（“尝试时期”，1917—1921年或1922年），但“新诗的标准”，却在“第二期”（“创作时期”，1922—1926年）的徐志摩、闻一多、朱光潜等人的作品中算是“完成”。“中国新诗的成绩，似应以这时为最好。”^①但“新月派”的标准显然不能囊括新诗发生时的蓬勃生机，郭沫若和李金发的诗，稍前或稍后，都“不受这一时期新诗的标准所拘束”，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夸张与激情，另一个属文白夹杂的生涩的象征主

① 沈从文：《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97页。

义，都以自己的想象方式和语言风格改变了新诗的既有标准。随着经验、语言和形式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变化，具体的写作将呈现出新的诗歌形态，新的诗歌形态也在不断修正既有的标准。可以说，诗歌的标准无疑是一道移动的边界，永远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话题，对写作的校正和作品的欣赏无疑大有裨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价值失范、多数领域陷入无序状态的时代，那些力挺某种诗歌标准的批评家是值得颂扬的，也许他们的主张不尽正确，他们的建议也不一定被接纳为“标准”，但他们的论述一定能激起人们对现存诗歌认识和评价体系的修正。

我们先辨识一下文学上的“标准”这个概念。朱自清先生 20 世纪 40 年代曾谈到“文学的标准与尺度”问题：“我们说‘标准’，有两个意思。一是不自觉的，一是自觉的。不自觉的是我们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我们应用这些标准衡量种种事物种种人，但是对这些标准本身并不怀疑，并不衡量，只照样接受下来，作为生活的方便。自觉的是我们修正了的传统的种种标准，以及采用的外来的种种标准。这种种自觉的标准，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大概多少经过我们的衡量；而这种衡量是配合着生活的需要的。”朱自清由此“称不自觉的种种标准为‘标准’，改称种种自觉的标准为‘尺度’”^①。这种区分对当代新诗评价的工作应该也是必要的：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的角度，当代新诗当然是“诗”，传统意义上“诗言志”、“诗缘情”的发生机制和“赋、比、兴”等艺术手法仍是有效的，应该算那种“不自觉的”“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此“标准”仍是我们评价当代新诗的一个基础。不过，从当代诗歌写作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和我们对之的期待来看，这个“标准”也应只能算“基础”。重要的是那些被称为“自觉的”配合着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对“传统的种种标准”和“外来的种种标准”进行修正而产生的“尺度”。如果说“标准”关乎的是“什么是诗”这一本体性的问题的话，“尺度”应是针对“什么是好诗”这一评价性的问题的不同方法。看来“尺度”似乎比“标准”更重要。

当代诗坛其实一直想明确到底什么是好诗这个问题，2002 年《诗刊》下半月刊整年都有关于“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2004 年 10 月《江汉大

^① 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朱自清全集》第 3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0 页。

学学报》有关于新诗标准问题的专栏、《天涯》主编批评家李少君先生也一直在呼吁新诗要树立标准……但今天看来，一切努力似乎收效甚微。也许，当代新诗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在评价“什么是好诗”的尺度上大家意见不一，而是在“什么是诗”这一本体性的问题上分歧严重，人们对“何为诗”都没有一个相对的“标准”，何谈评价诗歌好坏的尺度？

二 当代诗歌：本体认识无“标准”

2005年7月在海南岛西南原始森林尖峰岭召开的雷平阳、潘维诗歌研讨会上，诗人臧棣和批评家徐敬亚曾给我们上演了一场关于何为“好诗”的“尖峰”对决。与雷平阳《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一诗和潘维的诗作有关，臧棣与批评家徐敬亚的针锋相对很有意味——

徐敬亚：……雷平阳与潘维的诗歌各有自己的特点，两个人的状态也不同，潘维过于迷恋语言、语感。其实与人生比，语言不算什么。潘维有自己特别的优雅、安静、精细。雷平阳的诗，非常质朴，写出了生命……

臧棣：动不动谈什么生命个性，在我看来，这样来评价诗歌，是用古典标准评价现代，用八十年代评价九十年代……

徐敬亚：……我不赞同文化批评（笔者注：指潘维的诗歌写作方式），文化批评是错误的。何谓好诗，不难判断，一首有生命质感的诗歌就是好诗。

臧棣：每个人的生命质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看出来的生命质感才是唯一的，有的诗歌的生命质感也许你没看出来。

徐敬亚：你的诗歌里没有生命，你的诗代表文化。

臧棣：文化本身就有生命，文化永远有生命，要不怎么那么长久。

徐敬亚：你的诗歌蔑视生命。

臧棣：我从不蔑视自己的生命。

徐敬亚：你的诗里看不出有生命。

臧棣：你怎么知道我的诗歌里没有生命，每个人的生命质量不一样，你看不出来是你的问题。^①

当徐敬亚以“生命”、个性这样的词汇来评价诗歌时，臧棣认为这样做是以“古典标准”来评价现代诗，以80年代的诗歌标准来评价90年代诗歌。在他们的针锋相对与反唇相讥中，我们看到了当代诗歌标准内部的严重分歧。徐敬亚一直崇尚的是诗歌以语言切入现实、反映生命真实的那种触动人心的直接性，而臧棣从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型构的变化出发，更体恤不同个体的不同生存方式、对“现实”的不同认识，他由此也更愿意在诗歌中展开“现实”的虚构性与想象性，以繁复的语言和机智的想象呈现诗歌写作本身的趣味性和可能性，他的诗也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可鄙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典范。

在徐敬亚那里，好诗的标准是语言能个性化地、简约化地言说现实，他对“诗歌”的“简明定义”是“用最少的翅膀飞翔”——“作为最本质意义上的诗，是生命冲动中原发的闪电……”^②在他那里，诗是现实的衍生物，现实是一个实体，诗只要能分享它就行了。“诗与现实的同一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欣赏习惯里，诗就如同是伸向现实的一把筛子。而诗的好坏，则关系到筛子眼选多大的才算合适，以及晃动筛子时手腕的控制力量。人们似乎很愿意相信，从筛子眼中滤下的东西是诗歌的垃圾，而那些经由反复颠动最终留在筛子里的东西是诗歌的精华。或者说，那些渐渐在筛眼上安静下来的东西，才是对现实经验的新的组合。”^③好诗的标准是诗如何以最少的语言最有效地把现实赎买出来，让人震惊而愉悦，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写作经济学。

而在臧棣那里，现实本身是值得怀疑的，随着80年代那个宏伟的想象共同体的被解构，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与朦胧诗一代人不同，开始怀疑现实的虚构性，同时，随着政治权势向经济、文化权势等领域的转移，他们对抗政治、文化权势的热情也转向于语言的运作中，写作是一种政治实践，在语言的“弄虚作假”中解构不同的话语权势。由此，臧棣的好诗

① 《尖峰岭诗歌研讨会纪要》，《诗刊》下半月刊2005年第10期。

② 见《特区文学》2005年第11期《读诗·批评家联席阅读》栏目“十面埋伏”。

③ 臧棣：《听任诗的内在引领》，《特区文学》2005年第4期。